

●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与实践辩证法

——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考

王 贵 友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贵友(1946-),男,湖北老河口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

[摘 要] 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具有双重涵义:它包括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与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立根源于“扩大了的生产力”的异化,其异化的扬弃及人与自然统一的必要前提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与调整,社会交往关系的普遍发展与调整。人与自然统一的深刻的现实基础在于实践的辩证否定性,其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相互改造和相互建构。

[关键词] 马克思;人与自然;对象性;实践的辩证否定性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2-0133-06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新世界观”的建构中,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辩证法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处于理论的基础与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异化及其扬弃、人与自然统一的辩证否定性。对此,我国学术界已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共识。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是,这一理论内容是如何展开的,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还缺乏必要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A·施密特)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但主要限于关于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互为中介,以及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否定性的笼统的讨论,还未能对此作出系统阐述。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希望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的讨论。

—

对象性及对象性关系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讨论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到,这一范畴主要被用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展开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辩证法理论的逻辑基点。

对象性关系主要有两重涵义。第一是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不仅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说人是有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又

说,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1](第 105—106 页)。一方面,人把他自身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自然本质展现的对象;另一方面,人又成为他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的现实对象或其自然本质展开的对象。这种对象性关系显然就是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因此,他举例说,人的饥饿需要得到满足,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物和自然界;太阳是植物保证其生命的对象,植物又是太阳唤醒生命力量的表现的对象。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又是一般形式的对象性关系,不仅人与自然界之间具有这种关系,而且任何自然存在物都具有这种关系。

马克思所谈到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一思想在目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势下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对象性关系不仅包含人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级灵长类动物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相互区别,而且也包含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同一性和相互联系。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都有其同一的自然本质,人只有在自然之中才能生存。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又延长了自然史的系列。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活动已渗透到了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及地球生物化学物质能量的自然循环之中;另一方面,自然界又是人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第 56 页)。这种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指与人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它不仅为人类的生命活动提供大量必须的再生性与非再生性的自然资源,而且还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必要的自我改善或自我保护的作用。

第二是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第 107 页)。“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第 56 页)。作为类的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特殊意义上的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第 81 页)。这种“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特有的关系。

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何以能够建立起来呢?首先,这是基于人具有自我意识,能把自身和自身之外的他物作为意识的对象。动物可能具有一种原始的萌芽状态的意识,但却没有自我意识,不能把自我同它的生命活动及他物区分开来,还没有形成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人具有自我意识,能够意识到“我”是自己生命活动的出发点,能够把自我同他的生命活动及他物区别开来,已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化。所以马克思说:“动物是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第 57 页)。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表明,儿童在心理发育的早期,还处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完全未分化状态;当儿童心理发育到一定阶段时,便发生了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时“活动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主体的身体开始被看作是处于一个空间中的诸多客体中的一个;由于主体开始意识到自身是活动的来源,从而也是认识的来源,于是主体的活动也得到协调而彼此关联起来”^[3](第 24 页)。儿童心理发育过程重现了人类意识的起源过程。人只有能够意识到自身或自我是一切活动的来源,人类的自我意识才真正形成与确立起来。这种自我意识作为主体意识,不仅把人同他周围的自然界区别开来,而且还使人同他周围的自然界建立起了一种同一性和联系。人通过自我意识可“在理论上”把“自己本身的类”和“其他物的类”作为自己的对象,形成关于现实对象的一般意识或“自我”意识到了的对象。因此,“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1](第 56 页)。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界是被“自我意识”对象化的,以供人类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是人通过认识、评价和审美活动所达到的那部分自然

界,它作为主体意识到了的对象,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和确证。

其次,这是基于人具有劳动的特质,能把自身和自身之外的他物作为劳动的要素和作用对象。这种劳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指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诚然,动物如蜜蜂、蜘蛛、海狸、黑猩猩等,也能进行生产,但这是一种“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而不是“专属于人的劳动”或“真正的劳动形式”(马克思语)。劳动的最主要标志是使用工具特别是制造工具,但这种行为只有成为一个种群的普遍的、必然的、经常的、反复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劳动形式。正是这种行为不仅使人与他之外的自然物包括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分开来,又使人与他之外的自然界建立起了一种同一性和联系。在劳动中人同他之外的自然物都成为相互作用与互为中介的对象。同时,马克思指出:“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1](第56页)。由于人类的生命活动和感性的物质活动,自然界作为人类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源泉与基地,被纳入到了人类生活与生产方式之中。自然界既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又是劳动产品、劳动创造的对象世界;既是劳动的前提条件,又是劳动对象化、外化、物化的结果。它作为在劳动中生成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进一步确证和展现。

二

实践辩证法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及其扬弃上。实际上,正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以及这种异化的扬弃。

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他从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出发,讨论了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异化,认为作为劳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第52页)。在劳动的现实化中,劳动不仅外化为产品而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它还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人相对立,不是人支配和驾驭这种力量,而是人为这种力量所统治、所奴役。“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第53页)。在劳动的对象化中,自然界本来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产品,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但在异化劳动中,人们却丧失了这种劳动的前提条件和属于自己的对象。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界异化出去了,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对人的异化根源于劳动的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还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劳动的异化主要是指劳动对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异化,劳动成了维生的手段和创造私有财产的手段,因此“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第54页)。这里显然把人的类本质当成比人的存在更为先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个时代的劳动从人的类本质异化出去了。如果说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还是以人的类本质概念为前提的话,那么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抛弃了这一前提,直接把人的肉体组织与生理需要作为比人的本质更加先存在的东西,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第67页)。并且“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第67页)^①。这些活生生的个人是以特定方式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是受社会分工制约的个

人,是发生一定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现实的个人。正是这种现实的存在使个人本身的劳动活动在构成一种集体的社会力量时可能被异化,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2](第 85-86页)。

本文认为,一方面,现实的个人不同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或“自我意识”,他是有血有肉的具有一定自然与社会特质的个人。他必然具有特定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与主体结构及其能力,又在这些方面具有自己的缺陷和局限性。他必须处于特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而表现出自己的生产与社会交往能力,又受到这些关系的制约而有自己的局限。另一方面,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人类所面临的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全球化的时代,社会生产与科学技术已出现了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人类社会已成为知识与信息爆炸的社会。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决定了现实的个人必然会处于社会分工之中并受到社会分工的制约。并且,这种社会分工往往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状况与生产方式决定的。即使让他们“自愿”地去进行选择,自由地到任何部门和专业领域去变换自己的职业,成为一个不受专业分工限制的全面发展的人,那么他们在主观与客观方面都会受到一系列根本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受分工制约的个人的共同活动必然会形成一种客观的集体的“合力”或“扩大了的生产力”,这种客观的社会力量对于每一个人的自觉活动来说,都可能会变成某种外在的、陌生的、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对于人类的生存与生产活动来说,可能成为异己的东西。因此,由这种力量所决定的自然界对人的异化往往是很难避免的。加之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整体性、有机性、复杂性、迂回性、间接性,自然界对人的异化往往会变得十分突出。当今社会所出现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既然自然对人的异化根源于“扩大了的生产力”的异化,那么要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只有靠扬弃这种异化的力量以及与此有关的异化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这种理想的实现诉诸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认为在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存在的基础……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第 83页)。这时人之外的自然与人自身的自然都真正被人化,人的个性与本性得到了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然界得到了全面发展,于是人与自然才达到本质的统一。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必须求助于共产主义革命,但却不再局限于抽象的思辩的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或向人的本性的复归这类说教,而是强调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一基本前提,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的交往,……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第 86页)。在这种条件下,“异己力量”才会被扬弃,人和自然才能达到某种现实的统一。

本文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这些思想,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是合理的,它对于消除受分工限制的个人活动所产生的“扩大了的生产力”的异化,以及以此为根源的人与自然的对抗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在现代工业社会,为了扬弃这种力量的异化,人类还必须依赖于工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普遍发展”,而不是去人为地阻止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增长。况且这种社会力量具有自身的客观的发展逻辑,也不是随便可以阻止得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批判作为社会批判理论,虽然对于避免它们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此得出的关于停止其增长的消极结论却是不可取的。同时,人类又不能听任于工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还需要通过社会的力量不断对其进行调控和调整,如改变生产的门类、规模和布局,发展低消费低污染工业,发展生态工程技术等等,并在这种调控中寻求工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做到了发展与调整的有机统一与互为中介,才能使现代工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趋合理。另一方面,在当今工业社会,为了扬弃

“扩大了的生产力”的异化,每个个人和团体仍然会受到愈来愈精细的社会分工的限制,在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充分展现出各自的潜能。每个个人在社会分工中的充分发展构成了一种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为了避免这种力量的异化,还必须建立起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充分协调他们之间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使他们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这种“普遍交往”不仅包括个人之间的交往合理性及相互理解,也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政治体制的调整、法制的健全、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文化的进步等,还包括如上各个方面的国际间的合作。只有实现了社会分工中的自由发展与普遍交往的统一,由个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才会日益合理。实际上,正是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关系与社会力量发展的合理性的前提下,人类活动的异化的消除,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才是可能的,并且这种统一是在发展与协调的互为中介中实现的,是一个前进的过程。

三

就基本的生产技术实践而言,人与自然统一的深刻的现实基础在于实践的辩证否定性,其能动性 & 受动性、目的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人与自然的相互改变与相互建构。

首先,人与自然联系的基础是生产与消费的互为中介。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一方面,生产是一种消费。它不仅消费被加工改造的自然物的形式,而且还要消费劳动活动本身。另一方面,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直接给予的自然物首先是劳动资料,然后经过劳动加工改造而变成了有用的劳动产品,人类劳动活动作用于直接的自然对象,使其物化为人的现实的对象。对此,马克思指出:“创造形式的活动消费对象并且消费它自己,但它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中消费它自己。它在对象上消费对象”^[4](第 259 页)。这种消费作为辩证的否定,其结局又表现为对象,人类的主体意识介入到了消费与生产之中。首先,人们通过智力活动去否定物质对象的直接的自然形式,而在观念形态上实现对自然物形式的改变;然后,再通过体力活动去否定对象的间接的观念形态的形式,而在物质形态上实现对自然物形式的改变,并赋予自然物以新的形式,使之从抽象的自然对象变为人的现实的自然对象。正是这种过程建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联系。

其次,人与自然协调的基础是能动性与必然性的互为中介。在生产实践中,人既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既是必然的存在物,又是“自由的存在物”。人作为具有主体意识与生理心理需求的存在物,总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来改造自然物的形式,以便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和享受自然物质。人不仅要在其创造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这种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有两种意义。人类生产劳动总要受到自然规律、因果必然性、物质变换法则的制约,必须遵循、顺应这些自然法则,因势利导地发挥作用,有其受动性与必然性的一面;人作为具有主体认知能力的存在物,又能针对各种不同的自然对象,去正确认识和利用其自然规律和物质变换法则,有其能动的自由的一面。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第 58 页)。这就是说,动物只是自发地本能地根据它那个物种的生理结构和物质能量变换的法则去维持和再生产该物种的生命活动,人则能够针对不同的自然物,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各种自然物包括任何物种的内在形式、规律性和必然性,并运用它们去实行普遍的、全面的、间接的生产与消费活动。这是人类活动的能动性与自由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不仅人类的生产技术活动,而且人的肉体组织与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过程都要受到自然规律性、形式变换法则的束缚,特别是要受到作为人类家园的全球生态系统整体调节和自组织规律的制约。人类的生命与生产活动不能超出全球生态系统自调节自组织的限度,不能违背其自调节的动态平衡规律和自组织规律,以及各种自然对象的物质形式变换规律,如果违反了这种必然性,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同时,在不超出全球生态系统自调节自组织能力的限度内,在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活动空

间内,人们可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出发,自由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照物质变换的法则去建构自然物的形式,以享受和占有所有可能的自然资源

再次,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基础是它们之间的相互改变,及其双向调整与结构变换活动。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当人“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5](第 202 页)。本来,自然物总是以其固有的规律、必然性、形式变换法则去进行生产和消费,从而创造出了直接给予的自然界。但当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之后,便从自己的主体意识出发,根据对自然法则的自觉地认识与运用,通过生产技术活动的作用和介入,从而建构出了工艺学的、经济学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使自然界变成了现实的人化自然。当人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改造他身外的自然时,自然界也以其固有的“尺度”、内在的形式、规律和必然性反作用于他自身的自然并改变着他自身的自然。人自身自然的改造包括其感觉与运动器官及其功能、语言与思维器官及其功能的人化、调整、完善、延伸、进化(体内进化与体外进化),以及人自身的目的、需求、标准、尺度的改变和调整。正是在这种双向改造中,人与自然都变得丰富了,都实现了全面的发展,都实现了全面的本质的渗透。人与自然的相互改变、相互调整,是人与自然统一的深刻基础,是展现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深刻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德·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瑞士·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 [M]. 王宪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5] 德·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责任编辑 严 真)

Objectiv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 Dialectic of Practice

—— On Marxist Viewpoint of Nature

WANG Gui-you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Gui-you (1946-),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s The objectiv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mplicates two corresponding meanings: natural objective relation and social objective relation. Man's antagonism to nature originates in the "extendedn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alienation. The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the sublation of alienation and the unification of man and nature i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adjust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lationship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 realistic base of the unification of man and nature is the dialectical negativity of practice which implies unification of freedom and necessity,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 of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Marx; man and nature; objectivity; dialectical negativity of practice